



船 热

[美]安德烈娅·巴雷特 著 金晓宇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船热/(美)巴雷特(Barrett, A.)著;金晓宇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5
(精典文库)
ISBN 978-7-305-09637-2
I. ① 船… II. ① 巴… ② 金… III. ① 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08821 号

Andrea Barrett

Ship Fever

Copyright © 1996 by Andrea Barrett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NJUP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Wendy Weil Agency,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8-410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丛 书 名 精典文库
书 名 船 热
著 者 (美)安德烈娅·巴雷特
译 者 金晓宇
责任编辑 杨全强 芮逸敏

照 排 江苏南大印刷厂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9.25 字数 191 千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9637-2
定 价 26.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献给温迪·韦尔

本书中的部分篇章先前刊登在下列杂志上：《英国门生》载于《南方评论》；《潮汐地带》和《安第斯高山病》载于《故事》；《马伯格姐妹》载于《新英格兰评论》；《山柳菊的习性》载于《密苏里评论》。对这些杂志及其编辑表示感谢。《不寻常的鸟》首见于《写作之路：作家会议与节日新作选》（爱荷华大学出版社）；对他们同样表示感谢。

1995年，《山柳菊的习性》被评选为美国最佳短篇小说（简·斯迈利，特邀编辑）。

此外，亦感谢（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和“麦克道威尔文化营”赐予的时间和空间。

最后，还要感谢玛戈·利夫西、埃伦·布赖恩特·沃伊特、莎拉·斯通和卡罗尔·霍克·史密斯，感谢他们富有洞察力的阅读和富有思想性的意见。

目 录

山柳菊的习性 [1]

英国门生 [28]

潮汐地带 [43]

不寻常的鸟 [56]

安第斯高山病 [80]

没有脚的鸟 [107]

马伯格姐妹 [130]

船热 [173]

致谢 [281]

山柳菊的习性

我的丈夫理查德，在他退休前三十年的大学教学生涯里，在每年秋天二年级学生的遗传学课堂上，都会站在教室前面，分发格雷戈尔·孟德尔那篇著名的有关食用豌豆杂交论文的副本。理查德告诉他的学生们，这篇论文是思路清晰的典范，真正的科学就应该这样。

理查德在黑板前踱来踱去，不用稿子流畅地讲述着。像那个不太著名的进化论学者罗伯特·钱伯斯一样，理查德生下来也是一个六指畸形儿；幼年时他做手术去掉了左手多余的手指，由此留下了些许疤痕，而且他一直对此很敏感。因此，虽然他讲课时也用很多手势，但他只用右手，而左手一直放在口袋里。我每年秋天都来听他讲课，我会坐在教室后面，从那里我可以看到学生们是如何听讲的。

分发完论文后，理查德会给学生们讲他的第一个有关格雷戈尔·孟德尔生平的故事，也就是较为人知的那个版本。他告诉学生们，孟德尔在摩拉维亚西北角的一个小村庄里长大，那里当时是

哈布斯堡帝国的一部分，后来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因为家境贫穷，而且极其渴望受到更多的教育，于是他进入了当时的首都布吕恩（现称布尔诺）的奥古斯丁派修道院学习。他在那儿学习自然科学，后来就在当地的一所中学教书。1856年，在三十四岁时，他开始进行食用豌豆的杂交试验。他把紧靠修道院院墙的一小块菜园作为他的实验田。

接下来的八年里，孟德尔用了上千个植株，做了上百次试验，试图发现植物的性状是如何一代一代遗传的。植株有的高有的矮，开的花有的白色有的蓝紫色，豌豆有的起皱，有的光滑，豆荚有的拱起有的紧包着豆子。他对他的杂交试验做了详细的记录，最终写成了一篇论文，那就是现在学生们手里拿着的。在1865年的一个晴朗而寒冷的傍晚，他向布吕恩自然科学研究学会的会员们宣读了论文的第一部分。大约有四十人在场，几个是内行的科学家，还有很多热衷的业余爱好者。孟德尔朗读了一个小时，描述他的试验，并说明植物杂交品种中各种性状出现的比例是如何始终如一的。一个月后该学会的下一次会议上，他又提出了可以解释其试验结果的理论。

就在那里，我丈夫说道，就在那小小的、拥挤的房间里，遗传学诞生了。孟德尔不懂什么叫基因、染色体或者DNA，但他发现的一些原理使这方面的探索成为可能。

“有没有掌声？”理查德讲到这里总会发问，“有没有人大声高呼表示赞同或者哪怕小声咕哝表示反对？”一个修辞性的反问句；学生们也知道，所以没人去回答。

“没有。会议记录显示没人提问，也没进行讨论。房间里没有一个人明白孟德尔的论文的重要性。一年后，论文发表时，也没人注意到它。”

学生们低头看着论文，理查德讲完孟德尔如何返回修道院，接着忙于其他事情，就快速结束了他的故事。在一段时间里，孟德尔继续他的教学，还做些其他试验；他种葡萄、果树和各种花卉，他还养蜂。最终，他被选为修道院的院长，然后直到去世，他一直忙于行政事务。一直到1900年，他那未受关注的论文才被人重新发现，他的工作成果才被新一代的科学家所重视。

理查德讲到这儿，他总会把目光转向教室后方，和我的视线接触，然后微微一笑。他知道我明白他为学生们在期末准备了些什么。在他们读完那篇论文，并在实验室的试管里繁殖果蝇，以此验证孟德尔的遗传原理，艰难地度过这个学期之后，理查德将会给他们讲述另一个有关孟德尔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我告诉他的，故事讲述了孟德尔是如何被一个高傲的科学家同行以及山柳菊的习性引入歧途的。在这个故事里，科学才华不仅没受到赏识，还带来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孤独和惆怅。

我每年秋天都在那间教室出现是有理由的，而且理由并不只是因为我是一个尽职的太太。理查德不是第一个把孟德尔引入我生命的人。

我童年时，也就是大萧条的前几年，我的外祖父，安东·瓦库利克在尼斯卡云拿镇的一个苗圃上班，该市离我和理查德现在住的斯克内克塔迪市不远。这不是我外祖父干过的唯一工作，但却是他最最喜欢的一个。1891年，他带着怀孕的妻子离开摩拉维亚，去了不莱梅市，从那儿他乘船来到纽约，然后又乘船到了奥尔巴尼市。他本打算继续前往明尼苏达州或威斯康星州的某个大的捷克裔聚居区，但他妻子提前六个星期生下了我母亲，他不得不和全家人在这儿安顿下来。这里已有几户捷克人，其中一家雇我外祖父在他家生产用于女式上衣的珠光纽扣的小工厂干活。

后来，在他掌握更多英语之后，他找到了在苗圃的工作，这工作他是如此喜欢。他在那儿干了三十年；他非常擅长植株栽培和树苗嫁接，以至于退休年龄过了很久，雇主还留他任兼职。在苗圃里，大家都叫他托尼，这比他原来的名字听起来更像美国人的名字。我随我母亲叫他塔蒂，是“塔蒂耐克”的省略发音，这个词在捷克语里是“父亲”的意思。我的名字安东尼娅也是按他的名字起的。

我小时候从没挨过饿，我们比很多人家的日子过得要好些，但也是紧巴巴的。母亲接来针线活，改改上衣，补补裤子什么的；熨衣服的时候她总是把平整的那些留到最后，等拨了插头，电熨斗慢慢冷却时再熨。我父亲在通用电气厂的工资减少了，我的兄弟努力找零活做想补贴家用。我成了家里唯一清闲的人，于是在周末和暑假，母亲有时让我到塔蒂那儿去。我很喜欢塔蒂分派给我一些工作。

在苗圃里有大片长满了果树——桃树、苹果树和梨树——的果园，还有长长的、低矮的满是幼苗的玻璃棚子。我跟着塔蒂，在他移栽秧苗或用他的锋利的削刀和接枝封蜡干活儿时，我就帮帮忙。在他给花朵去雄蕊时，我坐在他旁边的一个高高的木凳子上，帮他拿镊子和装着甲基化酒精的罐子。我们一边干活儿他一边给我讲他初到美国时的情形。

塔蒂只有在他新上司出现的时候才会皱起眉头，沉默起来。原来的总园艺师谢尔登·哈迪和我们是朋友；他的年纪与塔蒂差不多，他们一起工作了很多年，一起修剪幼枝和给果树接枝。但是在1931年，我十岁那年，哈迪先生突发心脏病，此后去了伊萨卡市和他女儿一起居住。此后不久奥托·赖尼格接任了他的工作，他每天都会来破坏一下我们的好心情。

赖尼格肯定有五十好几了。他一有机会就跟塔蒂吹嘘他有西部某大学的硕士学位头衔。从他的实验室白工作服和办公室里的书本看来，很明显他自认为是个学者。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坐在一张硕大的橡木办公桌前，用一支从过去的好日子留下来的高档钢笔给塔蒂开列出一张张需要完成的任务单；过去他曾是一个植物园的主管。他把那些任务单用图钉钉在嫁接凳上，由于潮湿那些单子卷曲起来了，就像刨花一样。我们在暖房埋头干活儿时，他又会飘然出现，停留很久。他不会抱怨我的存在，但他对待塔蒂就像对待一个普通工人一样。一天，当我独自一人在一个满是我和塔蒂扦插成活的幼小的秋海棠的暖房里时，我和他撞见了。

塔蒂曾将一个小罐装了一个莲蓬喷头，当成小喷壶给我用，当

时我正用它给小秋海棠喷水。在玻璃屋顶下很热，我当时只穿了条短裤和一件塔蒂的旧白衬衣，白衬衣下什么也没穿，只有湿答答的皮肤；那时我只有十岁。靠着暖棚两边是几条长凳，中间是一只窄些的嫁接用的长凳。在嫁接长凳的一边，我站在一个翻过来的板条箱上，伸着胳膊，弯着身子去给前面的小秋海棠浇水。我一抬头，看见赖尼格站在我对面。他的脸圆而多肉，眼睛下有颜色很深的眼袋。

“你真是能干的小帮手，”他说道，“你可给你外祖父帮了不少忙。”塔蒂正在隔壁的暖棚里检查一批新栽成的灯笼花。

“我喜欢这儿，”我告诉赖尼格。我正在浇的是雷克斯秋海棠，人们种这种植物不是为了它的花，而是为了它华丽的有褶皱的叶子。我曾帮塔蒂把它的母叶用大头针固定在潮湿的沙子里，叶子主脉生根、长出幼苗后，又帮着移栽。

“这些看上去有些干，”赖尼格指着一排离他最近、离我最远的秋海棠，说，“在这儿。”

我不想绕过嫁接凳站在他旁边。“你够得着，”他说，“身子再斜一点儿就行了。”

我踮起脚尖，身体俯过凳子，举着喷壶去浇那些离我最远的秋海棠。赖尼格的脸色变红了。“对了，”他含糊地说道，“身子向我这儿斜。”

塔蒂的旧衬衫脖领开口很大，当我弯腰时衬衫从我的胸前耷拉下去。我伸直了胳膊，给秋海棠浇水。当我直起身时，我看见赖尼格的脸色很红，他身体紧贴着木凳。

“这儿，”他边说边颤抖地指向他右侧的另一丛秋海棠，“这些，这些也非常干。”

我非常害怕，但我也想完成我的工作，担心因为我的工作懒散给塔蒂带来麻烦。我又一次俯身过去，手里举着喷壶。这一次，赖尼格用他的粗手指来抓我的小臂。“不是那些，”他边说边把我的手移向更靠近凳子的边缘，而他仍然紧贴着凳子，“这些，这些非常干。”

正当喷壶掠过他实验室工作服胸前时，塔蒂走了进来。现在我能想象，在他看来那是个什么样的场景：我的身子俯过窄凳，我的脚尖几乎要从板条箱踩空了，而那白衬衫像一条床单挂向下面幼小的秋海棠；赖尼格红着脸，冒着汗，身子死死地贴着木凳；而他的手，那只脏手，正把我向他拉。当我听到塔蒂喊我的名字时，我的水壶应声落地。

谁说得清当时赖尼格脑子里在想什么呢？在塔蒂看来，肯定是赖尼格好像在把我拖过秋海棠，拽向他那边。但是赖尼格只是一个孤独的老人，而且现在在我看来，他可能只是想偷看一下我衬衫里面的模样，和轻摸一下我胳膊的内侧。如果塔蒂不是碰巧在那时走进暖房，也许不会发生什么别的事。

但是塔蒂却不这么想。他看见那只肥手抓住我的胳膊，那双眼睛死盯着我没发育的胸脯。塔蒂手里正拿着一把小修枝刀。正当塔蒂喊我的名字而我的水壶落地时，赖尼格下意识地紧抓我的胳膊；我用力想挣脱，这时塔蒂飞奔过来，用他的修枝刀扎进了赖尼格的手背。

“Nêmecky!”他喊道,“Prase!”

赖尼格尖叫起来,踉跄着后退。他后面是一个我平时站在上面给悬垂植物浇水的水泥礅子,那个水泥礅子绊住了赖尼格的小腿。他慢慢地重重地倒下去,一只手捂着另一只手的伤口,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塔蒂伸手去扶他,然而赖尼格的脑袋已经磕在一个暖气管上撞破了。

当然我告诉理查德的不是这些。我们初次相逢时,战争刚刚结束,我在我父亲曾呆过的通用电气工厂上班,理查德正要完成他的毕业论文。此前,在我父亲去世后,我从短期大学辍学;理查德中断了他的博士课程当了三年海军,在那里从事他的热带真菌研究。我们都迫切地想弥补失去的时间。在我们短暂的恋爱期内,我只告诉理查德那些我认为会使他爱上我的事。

我们第二次约会时,品着咖啡,吃着意大利馅饼,我告诉理查德,我小时候外祖父曾教过我一些植物培植的技术,我还告诉他我对遗传学非常感兴趣。“塔蒂和我们一起住了一段时间,在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我说,“他经常带我去尼斯卡云拿空旷的田野散步,还给我讲有关格雷戈尔·孟德尔的故事。我现在还能区分雌蕊和雄蕊。”

“孟德尔是我心目中的英雄,”理查德说,“他在我心中一直是科学家的理想典范。碰上一个了解他的成就的女士可是个稀

罕事。”

“我知道他很多事，”我说，“那些塔蒂告诉我的——你会感到吃惊的。”我没提及塔蒂和我聊起孟德尔，是因为要是聊我们两个所失去的东西，我们会受不了的。

塔蒂在审判前的几个月里睡在我的房间；他被保释，条件是他离开伦斯勒的小屋和我们住在一起。我睡在客厅的长沙发上，而赖尼格在斯克内克塔迪的医院里昏迷不醒。我们默然相对，塔蒂和我。似乎没人想和我们交谈。我的兄弟们尽量不呆在家里，父亲老是加班。母亲在家里，但是发生的一切使她心烦意乱，很难有心情跟塔蒂和我讲话。她所能做的最多就是把我拉到一边，那是在塔蒂到来几天以后，说，“发生在赖尼格身上的一切不是你的错。这是由来已久的民族仇恨，那些男人之间的事。”

她让我坐在门廊里，自己在那儿把她从林子里拾来的放在筛网上晾晒的蘑菇翻个儿，红的，黄的，蓝紫色的，浅黄褐色的。一些蘑菇已经晾晒得比另一些更干点儿。她一边说话，一边从一只筛网走到另一只筛网，翻转着那些纤细的蘑菇。

“什么民族仇恨？”我说，“你在说什么啊？”

“塔蒂是捷克人，”我母亲说，“就像我一样。赖尼格先生家是德国人，来自摩拉维亚一个只有德国人聚居的地区。塔蒂和赖尼格先生彼此都不喜欢对方，是因为很久以前发生在捷克的事情。”

“那我是捷克人吗？”我问，“发生的一切因为我是捷克人？”

“你是美国人，”我母亲说，“首先是美国人。但是塔蒂恨德国人。即使你不在那儿，他和赖尼格也会因为别的事吵起来的。”之

后，她告诉我一些摩拉维亚的历史，这些知识足以让我了解捷克人和德国人不和有多久了。她还给我讲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在美国的捷克和斯洛伐克移民联合起来，捐款筹集资金，帮助成立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时，塔蒂是多么兴奋。她告诉我，在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塔蒂和她妈妈曾经因为塔蒂捐款的事和他参加的那些会议吵过架。

但是这些似乎对我都不重要。在暖房里一个警察曾问塔蒂发生了什么，塔蒂回答说，“我用小刀扎了他的手。但接下来的是意外事故——他在那个礅子上绊了一下，然后摔倒了。”

“为什么？”警察问他，“你为什么扎他？”

“我的外孙女，”塔蒂说，“他在……摸她。”

警察用手抬起我的下巴，严厉地看着我。然后他问道：“他说的是真的吗？”我默默地点点头，既感到非常内疚，又感到非常了不起。现在我妈妈却告诉我说，我是无关紧要的。

“我应该恨德国人吗？”我问。

虽然几年以后，当塔蒂已经去世，我在上中学，而希特勒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时，我母亲大声疾呼地反对德国人，但是此时她只对我说：“不。赖尼格先生不应该那么做，但那只是他一个人。不应该恨所有带德国姓氏的人。”

“塔蒂是那样的吗？”

“有时候是。”

我告诉母亲塔蒂对赖尼格喊的那几个外国词，并尽可能好地模仿着那几个词。我母亲的脸红起来了。“Nêmecky 的意思是

‘德国的’，”她略显迟疑地告诉我，“Prase 的意思是‘猪’。你不许告诉任何人你听到外祖父说过这些话。”

我没和塔蒂谈论过这次和母亲的交谈。在那个秋天，特别是赖尼格死后，我一放学回家，就看见塔蒂在门廊上等我，手里拿着他多节的手杖，头上戴着帽子。他想散步，他急盼着想散步。我母亲不想让他一个人出去，但她自己很少有时间陪他出去；我的兄弟们很忙。于是塔蒂每天下午就像烦躁不安的狗那样等我陪他去散步。

当我们在房子后面的田野和树林里散步时，我们不谈论在暖房里发生的那件事。塔蒂告诉我，我们路过见到的那些蕨类植物、苔藓和花草的名称。他给我指出各种山柳菊——加拿大山柳菊，斑点山柳菊，“穷人罗宾山柳菊”。还有桔色山柳菊，俗称魔鬼的画笔，蔓延生长悄悄潜入空旷的田野里。这些植物有长长的茎，底部有莲座叶，和像蒲公英一样的小小的花朵。塔蒂告诉我之后，我才发现它们到处都是。

“山柳菊属，”塔蒂说，“这是它们的学名。这个名字来自希腊语里的‘鹰’这个词。因为人们认为它的茎干渗出的汁液可以使人的视力非常锐利。”它们是杂草，塔蒂说，但是非常坚强。它们能在任何其他植物无法成活的地方生长。它们和翠菊、雏菊和大丽花都属于菊科——那些花我在暖房里都看到过——但它们跟大蓟和牛蒡也都同属一科。我应该记住它们，塔蒂说过，它们很重要。塔蒂说他曾亲眼看见山柳菊是如何毁了格雷戈尔·孟德尔的一生的。

即使现在，这仍然显得令人难以置信：我怎么会认识一个年纪大到能够认识孟德尔的人？然而这是真的：塔蒂在布尔诺的郊区长大，而布尔诺正是孟德尔度过他一生中大部分时光的地方。1866年，在他们初次相遇时，布尔诺曾爆发霍乱，普鲁士军队在一场短暂而惨烈的战争之后正穿城而过。那时塔蒂十岁，所以对那些事一点也不关心。一天下午，他爬上奥古斯丁派圣托马斯修道院的白色院墙玩耍。正当他骑坐在墙头时，看见一个戴着眼镜的矮胖子正抬头望着他。

“他看上去像我妈妈的叔叔，”塔蒂说，“有一点儿像。”

孟德尔伸手扶着塔蒂从墙上跳下来。塔蒂发现周围都是果树和野藤；远处，他看见一座钟楼和一系列长长的低矮的建筑。塔蒂跳下来的地方，就在他脚下，种着豌豆。已不是孟德尔研究鼎盛时期的上千株，但也有上百株，攀附在木条和延伸开的绳子上。

那地方真使人着迷，塔蒂说。孟德尔带塔蒂参观了他驯养的、白天拴着晚上放出来自由活动的狐狸，还有他养的刺猬、仓鼠和老鼠，以及蜂箱和养着许多鸟的鸟笼。他们两个，那个男孩和那个中年人，成为了朋友。孟德尔教了塔蒂几乎所有他在园艺上的绝招，后来还为塔蒂在他教书的学校获得一份奖学金出过力。但是塔蒂说，他们友谊的第一年，在山柳菊试验开始以前，是最好的时光。他和孟德尔，两人一起，掰开豌豆的花瓣，用骆驼毛刷子给花授粉。

1866年的最后一天，孟德尔给慕尼黑的卡尔·纳吉里写了第一封信，那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著名的植物学家，据说他对杂交培植感兴趣。孟德尔随信还附上了他的豌豆研究论文的副本，希望